

兩漢文論譯注

曹順庆(主編) 陈 庄 张家钊 宋效勇



北京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

两 汉 文 论 译 注

曹顺庆(主编) 陈 庄
张家钊 宋效勇

北 京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诗大序》和司马迁、扬雄、班固、王充、王逸等人的文论为骨干，对它们的文论加以注解和翻译。注译前对各人的文艺思想还有较详细的述评。为了掌握两汉文艺思想的概貌，还有两汉文论概说，并收集了骨干部分以外两汉时期其他四十人有关文艺理论的言论。其中如贾谊、董仲舒、刘向、刘安、桓谭、仲长统等，都是在当时和对后世都有相当影响的人物。他们的言论涉及到文学、美术、书法以及美学等各种领域。资料详备，评述中肯。是研究两汉文艺理论的一部参考书和资料书。

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

两汉文论译注

Lianghan Wen Lun Yizhu

曹顺庆(主编) 陈 庄

张家钊 宋效勇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7.875印张 443,000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700

ISBN 7-200-00388-3/I·68

定 价：4.45元

编写说明

本书是北京出版社“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之一，其宗旨在于普及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为当代创作服务，并为古典文艺理论研究者、爱好者及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教师提供教学辅导资料。因此，本书既是一本古典文艺理论的普及读物，又是一本具有一定深度的研究性著作。

就普及性而言，本书对于两汉比较重要的文论原文都加了注解和译文，难字还加注了拼音。

就研究性而言，本书对于比较重要的文论家与论著，都撰写了具有相当份量的述评，除了介绍作者的生平和理论贡献、影响之外，还提出了一些个人的见解。

为了给读者提供两汉文艺理论之全貌，本书特设：“两汉文艺理论资料辑”一章，全面收录了两汉文艺理论资料；为了给研究者提供深入研究某一理论发展始末的原始材料，本书在重要文论家之后设了附录，收录了相当份量的后人评论资料以及历代文论家对某些重要理论问题的论述。因此，可以说本书又是一本经过整理的资料书。

本书由曹顺庆主编，参加编写者有曹顺庆、张家钊、陈庄、宋效勇、蒋晓丽。具体撰写分工如下：

一、两汉文论概说部分，曹顺庆

二、《毛诗序》部分，曹顺庆

三、司马迁部分，曹顺庆

四、扬雄部分，陈庄

五、王充部分：曹顺庆

六、班固部分：张家钊

七、王逸部分：曹顺庆

八、两汉文艺理论资料汇编：宋效勇。

由于水平和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本书考虑不周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我们殷切期待各位专家、读者的批评指正。

例 言

一、选材和编次

1. 译注部分选译了两汉比较重要的《毛诗序》以及司马迁、扬雄、王充、班固、王逸等人的文论，兹依时代先后次序排列。

2. 除单篇论文(如《毛诗序》)外，译注部分各家文论皆不按原书次序排列，而是按照文艺理论分类重新编排，以便于人们研读和查阅。

3. 入选各篇，与文艺理论无关的部分，在不过分损害原文完整性的情况下，采用节录的办法，节去部分一律加删节号。

4. 全书冠以“概说”，提纲挈领。各部分先列“述评”，再列“译注”，最后是“附录”。

5. 译注部分先列原文，然后是注释和译文。附录部分皆依时代先后次序排列。

6. 全书最后殿以“两汉文艺理论资料汇辑”。“汇辑”以全面详尽为宗旨，将两汉文艺理论资料(译注部分除外)收录殆尽，以便于人们研究两汉文艺理论之全貌。

7. “汇辑”不加述评，不译注，仅供参考；兹依时代先后次序排列。

二、注释和今译

1. 注释尽量做到通俗易懂，凡用典、用事、运用成语或引用资料，一律加注，对于难懂的字除加注文外，还加注汉语拼音。

2. 译文尽可能采用直译，属于译者自己补充的意思，用()号括起，以便读者对照原文，目的在于帮助读者理解原文，而不是

要代替原文。

3. 本书译注参考并吸收了一些国内的译注成果，书中未能一一注明，特此志谢。

三、版本与校勘

1. 入选各篇选录时，以一本为主，于篇末注明某某本，必要时注明参校本。

2. 原文选录一律用规范简化字，古文通假字，异体字因简化易生歧义者不改。

3. 凡原文有误之处，用（ ）号标出，并用〔 〕号将正确的字标出，于注释中说明根据，不径改原文。

目 录

编写说明·····	(1)
例言·····	(1)
一、两汉文论概说·····	(3)
二、《毛诗序》	
一、《毛诗序》述评·····	(23)
二、《毛诗序》译注·····	(34)
附录：后人评论《毛诗序》·····	(42)
三、司马迁	
一、司马迁文学思想述评·····	(59)
二、司马迁文论译注·····	(69)
1. 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69)
2. 文学的社会作用·····	(78)
3. 作家作品评论·····	(88)
附录：后人评论司马迁与《史记》·····	(94)
四、扬雄	
一、扬雄文学思想述评·····	(109)
二、扬雄文论译注·····	(122)
1. 论文学的社会作用·····	(122)
2. 论文学的标准·····	(124)
3. 论文学的形式与内容·····	(128)
附录：后人评论扬雄·····	(146)
五、王充	

一、王充文学思想述评·····	(159)
二、王充文论译注·····	(182)
1. 论文学的社会作用·····	(182)
2. 论内容与形式·····	(193)
3. 论真实与夸张·····	(206)
4. 论文学的继承与创新·····	(225)
5. 论语言的通俗易懂·····	(243)
6. 论作家的修养·····	(254)
7. 论鉴赏与批评·····	(271)
附录:后人评论王充与《论衡》·····	(285)

班固

一、班固文学思想述评·····	(301)
二、班固文论译注·····	(328)
1. 文学与现实·····	(328)
2. 文学的社会作用·····	(332)
3. 文学的起源和发展·····	(339)
4. 评论作家·····	(350)
附录:后人评论班固·····	(375)

王逸

一、王逸文学思想述评·····	(385)
二、王逸《楚辞章句序》译注·····	(391)
三、王逸《离骚经序》译注·····	(400)
四、王逸《九歌序》译注·····	(404)
五、王逸《天问序》译注·····	(406)
六、王逸《九章序》译注·····	(408)
七、王逸《远游序》译注·····	(409)
附录:后人评述王逸·····	(411)

两汉文艺理论资料汇编

编辑说明	(418)
编辑细目	(419)
一、陆贾	(434)
二、贾谊	(439)
三、枚乘	(444)
四、司马相如	(445)
五、董仲舒	(446)
六、司马谈	(458)
七、韩婴	(459)
八、刘安	(464)
九、刘向	(496)
十、刘歆	(510)
十一、桓宽	(511)
十二、汉宣帝	(516)
十三、王褒	(517)
十四、翼奉	(519)
十五、桓谭	(520)
十六、班彪	(525)
十七、汉明帝	(526)
十八、张奋	(527)
十九、傅毅	(528)
二十、王符	(529)
二十一、崔	(533)
二十二、张衡	(534)
二十三、许慎	(535)
二十四、马融	(537)
二十五、王延寿	(538)
二十六、崔瑗	(539)

二十七、李固	(540)
二十八、赵岐	(541)
二十九、何休	(543)
三十、刘梁	(544)
三十一、侯瑾	(545)
三十二、应劭	(546)
三十三、刘熙	(550)
三十四、蔡邕	(551)
三十五、赵壹	(553)
三十六、郑玄	(554)
三十七、颖容	(556)
三十八、荀悦	(557)
三十九、仲长统	(561)
四十、高诱	(563)

I、两汉文论概说

两汉文论概说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王朝之一，它历时之长（共四百零六年），疆域之广阔（东、南至海，西到巴尔喀什湖、葱岭，西南至越南中部，北到大漠，东北至朝鲜半岛北部）。国力之强大，文化之昌盛，使它与西方古罗马并列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强繁荣的国家。两汉的文学艺术与文艺理论，正是这强大帝国文明的结晶。“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共产党宣言》）要想了解两汉文论的特征，我们首先必须把握住两汉社会历史背景与思想文化的特征。

汉初，自高祖刘邦建立汉朝至景帝刘启，统治者鉴于秦王朝覆灭的教训，于是推崇黄老之术，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思想界亦比较活跃。这给予文学艺术发展以积极的影响。经过五、六十年的休养生息后，社会经济日益繁荣，国力逐渐强盛，据史书说，武帝时，经济力量已经十分雄厚，“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史记·平准书》）汉武帝凭借前期所积累起来的财富，施展其雄才大略，把崇尚黄老的无为政治，变成了以儒家学说为装饰的多欲政治。他对内加强集权专制，对外用兵，扩张领土，造成了汉代军事、文化的鼎盛时期。汉代杰出人物大多出现在此时。例如经学家董仲舒，文学家司马相如，史学家司马迁，音乐家李延年，军事家霍去病，天文学家落下闳，探险家张骞，农学家赵过。汉代的社会历史与思想文化特征，在这时体现得最

为鲜明。自武帝至东汉灭亡,这些特征基本保持下来了,只是在某些方面(例如谶纬迷信方面)发展得更厉害一些罢了。

汉代自武帝以后,其社会历史与思想文化特征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上的全面专制。

在政治上,汉景帝消灭了七个叛乱国,削去了各王国的权力。汉武帝在此基础上,实行推恩法,允许各王分城邑给自己的子弟,从此大王国分成了许多小王国,还设刺史稽查国王,有罪便奏闻,从此王国一蹶不振,而皇帝的专制却大大加强了。在经济上,汉武帝将铸钱、治铁、煮盐之大业收归朝廷官营,这大大增加了朝廷的收入,从经济上加强了皇帝的专制。在军事上,汉武帝好大喜功,以“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代价,取得了赫赫战绩。从军事上加强了专制。

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专制,必然导致思想文化上的专制,这种专制,集中体现在由董仲舒提出,汉武帝采用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上。这一方针,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是专制。一切思想学说,文学艺术都必须以儒家思想为标准,为其专制政治服务,不得越雷池一步;第二是迷信。它将儒家学说与迷信说法结合起来,炮制了一套“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神学目的论。东汉谶纬蜂起,就是这种神学目的论的必然结果。第三是保守。它提倡“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主张尊古卑今,“奉天而法古”。这种“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对两汉文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必须把握住这一点,才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溯源”。

首先,从第一个基本特征——“专制”来看,它在文论上的体现是一切以儒家文艺思想为准绳。无论是在文学的社会作用问题上,文学的批评标准上,以及几次大的文学论争上,无不体现了这一基本特征。下面先对这几点略加阐述。

从文学的社会作用上来看,两汉的文论家们,几乎没有一个不

大力提倡儒家的诗教,主张文艺应当为政治教化服务的。例如,短短的一篇《毛诗序》,竟可以不厌其烦地反复陈述这一点:“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提倡“发愤著书”的司马迁,竟也将此奉为金科玉律,认为文艺应当“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史记·乐书》)班固主张文艺应当“抒下情而通讽谕”。(《两都赋序》)王充认为文艺应当“劝善惩恶”,“增善消恶”,应当为政治教化服务。他说:“故夫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对作》)当然,提倡文艺为政治教化服务,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原是无可非议的。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都不能回避这一问题,许多中外文论家,都十分强调文艺为政治教化服务的重要性。但是,汉代的文艺理论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将文艺为政治教化服务,强调得过了头,企图把一切文学艺术都纳入政治道德范畴,甚至认为文艺为政治教化服务是文艺的根本目的。《毛诗序》(包括大序与小序)对《诗》三百的牵强附会的解释,便是力证。例如,《关雎》一诗,明明是诗人对河边采摘荇菜的美丽的姑娘的恋歌,《诗序》却偏偏曲解为“后妃之德”,说它是什么“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又如《小星》一诗,明明是奉使言劳之作,《诗序》却曲解为“夫人无妒忌之行,惠及贱妾”。其他诸序,无不如此。牵强附会,可笑至极。这种生拉硬扯,就连道学家朱熹也难以容忍,他说:“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意思尽穿凿坏了。……必欲如序者之意,宁失诗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处。(朱熹《诗序辨说》)为什么《诗序》要如此牵强附会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想把《诗经》当做道德教科书,以达到其文艺为政治教化服务的根本目的,因此,它完全无视《诗经》中表现人的其它情感的作品,而将其

硬解释为“风化”、“美刺”。难怪程廷祚说：“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诗论十三》见《青溪集》卷二）这种以“美刺”包罗一切的妄解，对后世文学艺术产生了极不好的影响，而这一恶果，正是汉代“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的必然产物。

从文学批评标准上来看，完全是儒家独霸，一切都以儒家文学批评标准为绳墨，绝不能越雷池一步。这方面的代表论点是扬雄的原道、征圣，宗经说。所谓“原道”，就是要遵循儒家之道，因为“孔子之道，其较且易也。”（《法言·吾子》）然而，儒家的道又是通过圣人表现出来的，因此要“征圣”，所谓“征圣”，就是验证于圣人，向圣人学习，“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山之蹊，不可胜由矣；向墙之户，不可胜入矣。曰：恶由入？曰：孔氏”。“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将谁使正之？曰：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或曰：恶睹乎圣而折诸？曰：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法言·吾子》）圣人在世时向圣人学习，圣人亡了，则向经书学习，这就是所谓“宗经”，“书不经，非书也；言不经，非言也；言、书不经，多多赘矣。”（《法言·问神》）这里，扬雄把儒家之道，把经书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将其作为一切“言”、“书”的最高标准，把儒家的圣人奉为至高无上的神明，这也是汉代文化专制，“独尊儒术”的必然结果。

汉代文坛曾经有过几次大的文学论争，论争诸家针锋相对，有时甚至剑拔弩张，水火不容。然而十分有趣的是，持论各异的诸家，其批评标准却基本是一致的！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怪现象，又是文化专制“独尊儒术”的必然结果。

汉代最大的文学论争，是关于屈原作品的评价问题。这次论争，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肯定，第二个阶段是否定，第三个阶段是再肯定。第一阶段的代表是刘安与司马迁，他们肯定了屈原的忠贞正直的高洁品格，赞赏屈原作品的“怨诽”特色，